

导 言

石家庄市地处河北省中南部，为华北腹地，京畿门户。其东部与衡水市接壤，西部和山西省相邻，南部与邢台市毗连。北部与保定市交界。现辖 6 区 17 县（市），即长安区、桥东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是市内 5 个行政区；矿区是以井陉煤矿为中心建立的县级行政区；市管辖辛集市（原束鹿县）、藁城市（原藁城县）、晋州市（原晋县）新乐市（原新乐县）、鹿泉市（原获鹿县）5 个县级市和正定、栾城、井陉、无极、深泽、行唐、灵寿、平山、赵县、元氏、高邑、赞皇 12 个县。辖区总面积 15848 平方公里，人口 924 万，市辖区面积 455.81 平方公里，人口 210 多万。

石家庄市所辖区域，是人类文明发展较早、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渊源较为悠久的地区。但石家庄市自身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它从一个藁尔小村发展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经过了几百年的逐渐演变而来的。300 年前，始有关于石家庄的文字记载，到清朝末年有人家 200 户，属获鹿县辖。随着 1903 年、1907 年京汉、正太铁路的建成通车建站，以及煤炭、焦化、棉纺等近代机器工业和工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兴起，石家庄才逐渐发展起来。到 1925 年，仅铁路以西的石家庄村街区面积已经达到 1.8 平方公里，形成了小城镇的雏形，成为与获鹿等县城规模相当的新兴城镇。中国共产党约于 1923 年底在此建立了石家庄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

市内和市郊的工农运动。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令，批准直隶省属11个城镇自7月1日起实行市自治制，其中成立了以石家庄村为其辖区的“石家市”。由于石家庄村及周围工商业人口还不足1万，获鹿县决定将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以石家庄与休门两个村村名各取一字，称为石门市，后石门、石家庄同用。同年8月29日，民国政府予以批准。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设立普通市和特别市大纲，撤销直隶省“石门市”等11个市的市自治制，主要政务由省直辖。同年9月，中共石家庄市委恢复，主要领导正太铁路、大兴纱厂和郊区农村的工作。之后，石家庄虽然取消了市制，但工商、邮电、服务等事业不断发展，各种行政机关和军政、商税等机构不断扩充增加。当时，石家庄的城市规模和交通地位已经超越了正定，逐步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1929年2月，中共石家庄市委和中共正定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领导着周围11个县党的工作，成为石家庄地区城乡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但3个月后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193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又在此建立了直中特委、石家庄市委，直到全国抗战爆发撤离市区。日本侵略军占领石门后，将其作为重要军事基地，驻有大量兵力，扩大城市规模，扶植傀儡政权，1938年1月15日成立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次年10月恢复石门市制。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石家庄市现辖区各县所在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建有地（特）、县委，在市内只有零星的地下组织在活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

石家庄市现辖县份，在1914年前，除束鹿、深泽属保定府外，其他各县均属正定府。1914年裁府设道后，除赵县、高邑归属大名道外，其余县份属正定道辖。当时正定作为河北中西部的中心

城市，在政治、宗教、文化、交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组织、开展工作方面对正定十分重视，1925年成立了县委，1926年又成立了正定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周围14个县党的工作。1928年6月，各县均属河北省直辖。中共石家庄中心市委、中共直中特委成立后，石家庄市现辖区内大部分县党的工作归其领导，各县均先后成立了县委。1935年河北省划为17个督察区，其中石家庄市现辖县分别归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区管辖。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按战时区划，以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和沧石公路为界，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分属的4个地（特）委、专署、军分区。在战争年代，人们习惯以“分区”称呼地、专级行政区，即晋察冀四分区（一度改为晋察冀三分区，最后改为察哈尔省建屏军分区）、冀中二分区（后改为晋察冀七分区、九分区）、晋冀豫二分区（后改为太行一分区）、冀南一分区（后改为晋察冀六分区、十一分区）。上述4个地、专级行政区隶属省（区）级行政区的沿革情况是：晋察冀四分区—晋察冀三分区—晋察冀四分区—察哈尔省建屏分区，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属晋察冀省，1938年10月至1941年1月属晋察冀区，1941年1月至1944年9月属北岳区，1944年9月至1947年11月属冀晋区，1947年11月至1949年1月属北岳区（后），1949年1月至8月属察哈尔省；冀中二分区—晋察冀七分区—晋察冀九分区，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属保属省，1938年1月至8月属冀中省，1938年8月至1949年7月属冀中区；冀南一分区—晋察冀六分区—晋察冀十一分区，1938年3月至8月属冀南省，1938年8月至1940年6月属冀南区，1940年6月至1949年至1949年7月属冀中区；晋冀豫二分区—太行一分区，1937年10月至1938年8

月属冀豫晋省，1938年8月至1943年10月属晋冀豫区，1943年10月至1949年7月属太行区。上述4个分区，均分别设有中共地（特）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军分区及专区各群众团体组织。地、特委组织，抗战开始时建立的均称特别区委员会（简称特委），一般于1938年8月至1939年1月均改称地方委员会（简称地委）。对于地委、专署、军分区名称的命名，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晋冀豫区、冀南区，均分别在本区（省）内依序码命名（一度在全边区内统一依序码命名，但没有严格执行）；在晋察冀边区，自1940年7月起，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简称边委会）、晋察冀军区统一依序码命名全边区的地委、专署、军分区的组织名称，但同一地级行政区的地委、专署、军分区的名称序号并不一致。1944年6月，晋察冀边委会统一调整了各专署的名称序号，从而使同一地级行政区内的地委、专署、军分区名称序号一致起来。后来，晋察冀边区各地委、专署、军分区区划虽有多次调整，但同一地级行政区内所设的地委、专署、军分区名称序号都是一致的。1948年5月，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边区合并为华北行政区，原晋察冀边区内各地委、专署、军分区名称序号大多延续下来，直至1949年8月恢复河北省，经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原以数字命名的地级组织名称取消，改由以地域名称命名地委、专署、军分区组织名称。下面，分别就4个分区的地（特）委、专署、军分区组织设置及沿革作一说明。

晋察冀四分区—晋察冀三分区—晋察冀四分区—察哈尔省建屏分区，于1937年10月建立中共冀西特别区委员会，11月改称中共晋察冀省第四特别区委员会，1938年10月改称中共晋察冀区第四特别区委员会，1939年1月改称中共晋察冀区第四地方委员会，1940年6月改称中共晋察冀边区第四地方委员会，1946年

5月改称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三地方委员会，1947年5月复称中共晋察冀边第四地委，1949年1月至8月改称中共察哈尔省建屏地方委员会。该地区于1938年12月建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领导的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0年5月改称晋察冀边区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4年9月改称晋察冀边区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6年5月改为晋察冀边区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7年5月复称晋察冀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1月改称察哈尔省建屏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该专区所辖石家庄市现辖区内的县份有平山、灵寿、行唐、获鹿（路北）、井陘（路北）、正定、新乐（西）等县。1940年8月，在获鹿、井陘、平山三县交界的三角地带设立建屏县，1945年10月撤销。该地区于1937年11月建立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1946年5月改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1947年5月复称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1949年1月至8月改称察哈尔省建屏军分区，设分区人民武装部。

冀中二分区—晋察冀七分区—晋察冀九分区，于1938年5月建立中共冀中省第二特别区委员会，8月改称中共冀中区第二特别区委员会，1939年1月改称中共冀中区第二地方委员会，1940年7月改称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七地方委员会，1946年5月改称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九地方委员会，至1949年7月未变。该地区于1938年9月建立冀中区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0年7月改称晋察冀边区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4年6月改称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6年5月改称晋察冀边区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该专区所辖石家庄市现辖区内的县份抗日战争时期有新乐、束（鹿）晋（县）、藁（城）无（极）、晋（县）深（泽）（无）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有新乐、无极、深泽。该地区于1938年5月设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1940年6月改称晋察冀

军区第七军分区，仍由冀中军区直接领导，1946年5月改称晋察冀军区第九军分区。

冀南一分区—晋察冀六分区—晋察冀十一分区，于1938年3月建立中共冀南省第一特别区委员会，8月改称中共冀南区第一地方委员会，1940年6月改由冀中区党委领导，改称中共冀中区第一地方委员会，8月改称中共晋察冀边区第六地方委员会，仍归冀中区党委直接领导，1946年5月改称中共晋察冀边区第十一地方委员会，至1949年7月未变。该地区于1938年10月建立冀南行署第四专员公署属下的滏北办事处，1940年5月改建为冀南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0年6月该区全建制改属晋察冀边区冀中区，专署名称序号为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4年6月改称晋察冀边区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6年5月改称晋察冀边区第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该专区所辖石家庄市现辖区内的县份有辛集、晋县、藁城、赵县、栾城等县及先后组成的束冀、深束、晋藁、晋北、藁正获、正获、栾正获、赵元宁等联合县。1946年5月，六分区划入部分县，辖束鹿、正藁、晋县、栾城、赵县、深泽、无极、新乐、藁正获县，辛集市及非石家庄市现辖区内的深县、宁晋县。该地区于1938年4月建立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1940年7月划入冀中军区，改称晋察冀军区第六军分区，仍受冀中军区直接领导，1946年5月改称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1947年11月改设第十一军分区人民武装委员会

晋冀豫二分区—太行一分区，于1938年1月建立中共冀豫晋省晋冀特别区委员会，6月改称中共冀豫晋省晋冀特别区委员会，8月改称中共晋冀豫区晋冀特别区委员会，1939年1月改称中共晋冀豫区晋冀地方委员会，3月改称中共晋冀豫区冀西地方委员会，10月改称中共晋冀豫区第三地方委员会，1941年1月改建为

中共晋冀豫区第一地方委员会，1943年10月改称中共太行区第一地方委员会，至1949年7月未变。该地区于1937年10月设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办事处，1938年8月建立冀南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0年8月改称太行区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至1949年7月未变。该办事处、专署所辖石家庄市现辖区内的县份有赞皇、元氏、高邑等县，以及井陘（南）、获鹿（南）等，曾设立高赞元、元获等联合县。该地区于1938年4月设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1940年6月改称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亦称晋冀鲁豫第十二军分区）。

关于1940年7月以后晋察冀边区各地委、专署、军分区的组织名称，由于其名称序号是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边委会、晋察冀军区在全边区统一排定命名的，其规范全称已如上所书，即均应在地委、专署的名称序号前冠以“晋察冀边区”，军分区前冠以“晋察冀军区”。但是，历史上为了表明某地委、专署、军分区所在省级行政区，往往在地委、专署、军分区名称序号前改冠以所在区地域名称。例如，1941年1月至1944年9月期间的晋察冀边区第四地委，因其在北岳区内，受北岳区党委（含工委）直接领导，即称之为“北岳第四地委”；1944年6月至1946年5月期间的晋察冀边区第七专署，因其在冀中区内，受冀中行署直接领导，故称之为“冀中第七专署”；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期间的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因其在冀中区内，受冀中军区直接指挥，遂称其为“冀中第十一军分区”。本书有关章节，多处采用了这种历史习惯称谓。

194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石门。同年12月26日，经晋察冀边区政府批准，石门市改称石家庄市，均为边区直辖市，设直属于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华北局的中共石门市委员

会—中共石家庄市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华北区人民政府直辖的石门市政府—石家庄市政府—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直接指挥的石门市卫戍司令部—石门市警备司令部—石家庄市警备司令部。

1949年8月5日，河北省划设石家庄专区，成立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委员会、河北省石家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河北军区石家庄军分区。同时，石家庄市改为省辖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家庄地、市先后经历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多次变动。199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石家庄地委、行署，将地市合并，改称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实行市管县的体制。

以石家庄市现辖区为范围追溯历史所编著这部《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第一卷，就是在上述石家庄市现辖区内的各级、各个地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上一级党委工作具体部署与要求，历经28年，带领石家庄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民族革命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

第 一 章

中共石家庄地方组织的成立 与 初 步 发 展

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地方执行委员会诞生于 1923 年下半年。该地委的建立和发展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和形成一样，与铁路的修筑、通车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先后派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人来石家庄和正太铁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组织工人运动，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此，石家庄城乡的工农运动迅速得到开展，中共地方组织冲破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第一节 石家庄工人阶级的诞生

一、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长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华民族，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将一系列侵略、掠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随之而来，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门被打开，领土被割裂，主权遭破坏，自给自足的封

建经济基础被打破。资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思想文化渗透，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从此，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

作为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心直隶省，势必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军事、文化侵略的重要地区之一。自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特别是与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签订后，给直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处直隶中心区域的石家庄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有“天下九塞之一”和“北方最良之煤田”的山城井陘，有商贾云集的“旱码头”获鹿，有“金束鹿”之誉的辛集、藁城等平原地区。还有“燕南公郡，京师屏障”的古城正定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山清水秀、土质肥沃、六畜兴旺、矿藏丰富的自然条件，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垂涎之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正定、获鹿、无极、行唐、灵寿、平山、井陘等地，镇压义和团运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石家庄人民对侵略者的暴行极为痛恨，曾自编了一首民歌流唱了数十年。歌词曰：“伤心事，辛丑初，洋人蹂躏我蒲吾，劫我钱财烧我房，毙我人命数百余。人逃窜，家散离，殃及村庄犬与鸡。儿时我等在襁褓，恨不食肉寝其皮。”^①这时，石家庄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既带有中国社会的共性，也带有它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就地域上讲，它处于内陆地区，列强入侵和资本主义的渗透掠夺相对比沿海地区较晚；但就其程度上讲，却是“重灾区”之一，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巨大

^① 石家庄地区方志办编《石家庄地区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757页。

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特别是自 1899 年 9 月美国又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到《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石家庄攫取了一系列的特权。他们在这里办工厂，设银行，开矿山，修铁路。从 1901 年开始，德国人获取了井陘煤矿的开采权；1903 年法国和比利时攫取了京汉、正太铁路的修筑权，同时还在石家庄修建正太铁路总机器厂（今铁道部石家庄车辆工厂），作为其配套工程。之后，他们利用便利的水路、陆路交通，大肆掠夺白银、粮棉、矿藏等物资，运回本国加工后，又将大量的布匹、百货等轻工产品运输到石家庄倾销，如洋布、洋火、洋油等等。洋货的不断涌入，极大地冲击和破坏了石家庄的地方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使大多数工商业日渐萧条，甚至被迫倒闭。但是，石家庄的民族工业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形下，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到 1922 年，相继建成的有永聚公铁工厂、电灯公司、同益兴铁工厂、立元荣工厂、大兴纱厂等 30 多个大小工厂以及纺织、皮革、面粉加工等手工业。这些民族工业因受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及商品输入的排挤，其发展极为缓慢。同时石家庄的商业也伴随着工业的发展而逐步兴盛起来，一批商号、药房、作坊应运而生，石家庄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日益重要。

资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又实施文化侵略。他们在石家庄设立教堂，发展教徒；宣传西方的“文明”，散布奴化思想，企图从精神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以建立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为名，蒙骗麻痹人民，达到其思想文化侵略的目的。实际上，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以传教为名，进行政治的甚至军事的间谍活动，用金钱收买一些地痞流氓充当其耳目进行“吃教”。这些“吃教”者为所欲为，依仗洋教士，进行着霸占田

产、讹诈民众、侵犯人权等罪恶勾当，连地方官吏也不敢过问。与此同时，清廷为挽救其即将灭亡的统治，大办洋务、开办学堂。这时，在石家庄城乡已涌现了一批公立、私立中小学校。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内外交困，国势日衰。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深，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广大民众为了生存，纷纷组织起来，进行了多次英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1869年，石家庄农民起义军聚首封龙山，响应白莲教起义，在正定、获鹿、元氏等地抗税反清。1900年，义和团在定州、深泽、无极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焚烧教堂，杀洋教士。八国联军一部窜入束鹿县后，旧城的勇士们手持大刀长矛、抬枪火炮与敌拼杀，打得敌人望风而逃。同年10月，大同镇统制刘光才奉命在井陘设防，抵御德、法军为主的八国联军4个多月，打死打伤侵略者1800余名，迟滞了其西犯的企图。当时，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虽然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它充分显示了石家庄人民团结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反帝爱国的英雄气概，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直隶革命党人积极筹备武装起义、会攻北京，直捣清廷，配合南方的革命行动。这时，吴禄贞在石家庄策动了燕晋反清武装起义。

吴禄贞，湖北云梦人，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加入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并领导的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兴中会。1910年回国，在清军袁世凯部下任第六镇统制，驻防保定。山西革命军起义胜利后推举阎锡山为都督，宣布独立，攻占娘子关。清廷急命袁世凯派第六镇前往镇压。这时，清廷特任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率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

吴禄贞奉命来石家庄后，为便于应付变局，拒绝住公馆，而

下榻在大石桥畔的火车站站长办公室旁的票房。他一面以山西革命军接受招抚的假情况，电告清廷，一面又与晋军阎锡山联系，密议组成燕晋联军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统治。10月2日，吴禄贞断然下令扣留由北京运往湖北前线镇压起义军的军火辎重列车。消息传到武昌，革命军欢欣鼓舞，晋军也主动派人来石联络，并邀请吴禄贞到娘子关与阎锡山会面。于是，吴禄贞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还暗中刻好“燕晋联军大都督”的关防大印。之后，又亲赴娘子关，与阎锡山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成立燕晋联军，推举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司令，并商定于11月7日凌晨，晋军与六镇在石家庄会师举行起义。之后，吴禄贞立即返回石家庄，在电报局大楼紧急召开中级以上军官会议，宣布7日凌晨起义的决定。

就在吴禄贞紧张部署武装起义之时，叛徒向清廷告密，袁世凯用重金收买刺客，令其火速赶往石家庄刺杀吴禄贞。11月7日凌晨，吴禄贞正在火车站司令部与部下一起研究军情。突然，刺客马蕙田率士兵多人闯入，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等当场杀害，并凶残地割下吴禄贞的首级，以备赴京请功。这时，石家庄大石桥周围枪声大作，秩序混乱。各部队官兵不明真相，不知所措。晋军第一营刚到石家庄，就听到吴禄贞遇刺消息，遂拆毁正太铁路十余里，将六镇的军火器械、粮饷装备运往山西。吴禄贞部下闻讯后，仍然按原定计划与清军对战。经过激战，清禁卫军败退正定。在山西革命军的接应下，部下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的遗体送到娘子关草草埋葬。^①吴禄贞遇害时年仅31岁。石家庄人民和山西人民为了纪念这位革命英雄，于1913年在其牺牲

^①《吴禄贞史料集》石家庄文史资料第12辑，第94—100页。

的石家庄火车站北侧，兴建了吴公祠和墓园，将同时遇难的两位烈士一并安葬于此。葬礼这天，参加者万余人，孙中山先生派专使前来祭悼。^①

吴禄贞捐躯石家庄后，仍有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顾生命安危，以教师、职员等身份潜入正定、辛集、元氏、赵县等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唤起民众的觉醒。辛亥革命在石家庄地区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正太铁路总机器厂工人纷纷剪掉发辫争当革命军，后又组织了一次索薪斗争，迫使法国资本家答应了条件。这期间，吴禄贞的好友李安良还来到正太铁路总机器厂，组织工人建立了中华民国工党会，成为正太铁路早期的工人群众团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来石家庄正太铁路局视察，极大地鼓舞了石家庄人民的斗争热情。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使革命遭到失败。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由帝国主义扶植操纵下的封建军阀统治取代了清王朝的统治，政治上更加黑暗，半殖民化进一步加深。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形成了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段祺瑞皖系军阀和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冯国璋直系军阀。此外，邻近河北的山西还有晋系军阀，南方各省也在大大小小的封

^① 1981 年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之际，石家庄人民又将吴禄贞等三位烈士的陵墓迁于今长安公园，供人民群众长期凭吊瞻仰。

建军阀控制之下。军阀割据，不断混战，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在经济上，工农商业日益萧条，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人民生活更加痛苦。

石家庄地区封建地主豪绅把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兼并土地的现象愈加严重，盘剥农民的手段更加残酷。如辛集胡合营村大地主王堂生，一家拥有土地 4000 余亩，在八里庄、晋县都设有佃户庄。喂养骡马百匹，雇用丫环、老妈子、厨师、裁缝、长工、短工 100 多人，还有管家、打手 40 多人。仅宅基地就占百亩，建房近千间。地主和富农的人口虽然仅占农村总人口的 10% 左右，却占有着农村的大部分土地，致使广大农民逐渐丧失土地，甚至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正如《元氏县志》所记载的那样：“良田沃土，多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贫苦农民或寡守薄田瘠壤；或完全丧失土地，沦为佃户；或出卖劳动力谋生。境内荒灾屡发，稼禾欠收。官府富豪，巧取豪夺，贫苦农民终年累月，备受艰辛，如牛负重，仍难以解决温饱”。封建地主豪绅利用雇工、出租土地、放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地盘剥农民。其主要形式和手段有：

定租制：地主、富农和农民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约定土地租额，农民租地后，不论年景丰欠，均按原定租额交租。租额高者为倒三七分粮（即地主占总收获的七成），或产量一石二三而租额一石，并由农民负责交纳银粮（即农业税）。

分租制：由地主、富农出租土地，秋后与农民各得产品的 1/2 农民所用的牲口、农具、种子、肥料等由自己置办并负责交纳银粮。收获或打场时邀地主到场头收租。有的地主富农见物就分，分成份额有的达到倒三七、倒四六。

停三堆：即由地主、富农提供种子、肥料、农具、牲畜等生

产资料，农民只出劳力，收成分为三等份，地主得二、农民得一，并由农民交纳银粮。

贷把：地主除提供种子、肥料、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外，还雇用一定数量的长工与农民一起劳动，收获物地主取七八成后，剩余部分再由地主和农民对半分配。

雇工：地主雇佣丧失土地或少有土地的农民作为廉价劳动力，以长工和短工的形式，土地由雇工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地主。长工按年或月领取工资，短工按天领取工资。不论长工和短工，报酬都很低微，有的只能混碗饭吃，多数佃户和雇农难以维持一家的生活。^①除以上几种外，还有一种类似劳役地租的形式叫做“认差租地”、“租地带差”、“当地租地带差”。这种形式就是谁种地、谁出官差。地主只收地租，不出差役。地主、富农以转嫁差役负担为目的的地租剥削制度，更加剧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放高利贷是地主、富农剥削穷人的又一重要手段。“放利钱”年利率一般在 3 至 5 分，穷人借钱利息特别高。穷人要指地借钱，叫“当租”，到时还不了钱要没收土地。青黄不接时借粮每借一斗要还 1.5 斗至 2 斗。还有“现扣利”、“出门利”、“蹦蹦利”、“臭虫利”等等。

广大贫苦农民除了遭受地主残酷剥削外，还要向政府、军阀交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及多次加抽的附加税。此外，官僚、地主富农还操纵物价、市场。在麦收、秋收时，趁农民卖粮还账之际，大量压低市场价格，抢购囤积；在青黄不接时，却又抬高物价出售，大发横财。各种名目繁多的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生

^①《石家庄地区志》石家庄地区方志办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第 185 页。

活难以为继，有的被逼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有的外出乞讨，流落街头，甚至冻饿而死。

城市居民也不例外，除了正常的地丁粮税，田房契税，茶、烟酒、粮等税外，还要加收百货捐、米粮捐、茶业捐、药材捐、警务捐等等，鸡鸭鱼虾猪肉茶栈，“几乎无物不捐”。新税和附加税多达 50 多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石家庄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随时面临破产的威胁，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激化，整个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局面。

二、石家庄工人阶级的诞生

石家庄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民族工商业的兴起而产生的，也是伴随着铁路、煤矿、炼焦和纺织业的兴建而壮大起来的。石家庄铁路工人是石家庄产业工人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的一支。

1896 年，清廷依赖法国、比利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拟修建一条横穿中国心脏地带的卢汉铁路。10 月，在北京设立卢汉铁路总公司，大买办盛宣怀任总督办，开始筹建。清廷将从英、法借来的白银 1000 万两和存款 300 万两作为官股；同时，又向比利时贷款数百万两白银，由华俄道胜银行主事，由俄、法作为比利时后盾，由比利时出面承建。建成后由比利时和法国共同经营，期限 30 年。从此，俄、法、比三国取得了控制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卢汉铁路从 1898 年 2 月在卢沟桥开始动工 同年 12 月修至保定。当年卢保铁路通车后，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刚要接手经营，中国北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因此，卢汉铁路的修筑因此中断数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1901 年，法国、比利时又重新修建此路，并将起点延伸到北京城，改名京汉铁路。1902 年京汉铁路修至石家庄，在正定建有火车站，次年又在石家庄建